

《政治通鉴》与中国政治学

——十一位中国学者对谈录

作者：俞可平 李景鹏 邓小南 杨 河 李 强 张小劲

周光辉 徐 勇 陈国权 肖 滨 唐士其*

整理：王 俊**

编者按：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老师领衔主编的《政治通鉴》第一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式出版。2020年7月30日，在《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中，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十一位学者围绕《政治通鉴》的编撰意义、基本内容、主要特色与改进建议等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他们指出，《政治通鉴》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既包括政治学经典文献研究，也包括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既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一般规律，也探讨了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普遍规律。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的不足，为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研究树立了一根支柱，开创了“政

* 俞可平，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北京大学教授；杨河，北京大学教授；李强，北京大学教授；张小劲，清华大学教授；周光辉，吉林大学教授；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陈国权，浙江大学教授；肖滨，中山大学教授；唐士其，北京大学教授。

** 王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治通鉴学派”，是中国政治学界的标志性成果，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现代中国政治学需要《政治通鉴》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人类文明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举世公认的绝世奇才。这位出生于公元前384年的古希腊天才创立了多门基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的许多重要学说至今仍是这些学科史上的丰碑。在他涉及的所有学科中，政治学一直被他断定为最重要的学科。他认为，人类作为最高级的“政治动物”，其终极目的，就是追求幸福生活。让所有公民都过上幸福生活，则应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政治学之所以是“主导学科”，是因为在众多学科中，唯有政治学着重关注“城邦最高的善”，即城邦国家的公共利益。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增进城邦的公共利益，让全体公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什么同一群人在同一地域中，有时富裕，有时贫困？有时野蛮，有时文明？有时内战，有时和谐？有时堕落，有时进取？有时贪婪，有时慷慨？（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亚里士多德之问”。）亚里士多德毕生致力于思考这些问题，他的政治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他对上述“亚里士多德之问”的终极回答便是：政治制度是决定城邦命运和公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他说：“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因此，亚里士多德极其重视政治与政治学。为了寻求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他曾经带领成百上千的学生，对古希腊的158个城邦国家的政体逐一进行考察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便是他对古希腊城邦国家政治制度考察与分析的最终成果。

中国古代的先贤大儒也特别重视政治，把王权和王道看作社会稳定和国家兴旺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以史为鉴”的悠久传统。这里的

“史”主要就是历代的政权兴衰史，这里的“鉴”则主要是针对国家统治者而言的政治得失。从文献记载看，早在西周时期，王朝就设有史官，开始官修历史。据《逸周书》所载，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记》并非后人熟知的司马迁所著。西周在位时间最长（前 976 年—前 922 年）的周穆王，就命令左史戎夫作《史记》，主要内容便是记载 28 个古代国家的亡国教训。司马迁的划时代巨著《史记》，实际上主要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的兴亡史。《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以及“书”“表”的基本内容，无非就是历代帝王、诸侯、大臣的政治传记，以及历朝重要政治制度的记录。司马迁欲通过编纂《史记》，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这里的“变”，主要也是历代的王朝政治之变。至于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名就开宗明义：总结历代政治得失，为君王统治提供借鉴。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资治通鉴》的宗旨，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可见，“讲政治”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

传统中国有重政治的传统，却无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泛指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政治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问题、概念、方法和公理，是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取代的基础学科，对人类的政治进步和知识进步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一，政治学有助于确立人类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人类的政治进步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方向。为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设定目标，奠定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是政治学的首要功用。其二，政治学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人类的政治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从现实政治生活中发现规律性的政治现象，是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其三，政治学有助于确立政治评价标准，推进人类政治进步。政治进步、政治评价必须有客观和科学的标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提供政治评价的标准，使得政治进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衡量尺度。其四，政治学有助于解释社会政治现象，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本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和政治利益，政治学知识帮助人们认清政治生活的实质。其五，政治学有助于总结人类政治的游戏规则，影响人类的政治制度设计。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一般认为，1899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专门的“政治讲堂”，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的发端。政治学在中国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在过去的120年中，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中国政治学时断时续，在曲折中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错误地将政治学当作“伪科学”，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在我国不复存在，它在我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30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学等学科要尽快恢复的直接指示下，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才得以在中国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重政治而轻政治学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在中国的知识体系中，传统的政治经典文献浩如烟海，而现代的政治学经典则寥若晨星。以工具书为例，《史记》《资治通鉴》乃至整个“二十四史”，以及各种《大典》、“全书”，均可算作传统的政治经典文献资料，而现代的工具性政治学基础文献则十分稀少。改革开放后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传统政治经典作为工具性文献与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有三个重大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传统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代王朝政权的制度和更替，现代政治学工具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知识；二是阅读对象不同，传统文献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统治阶层，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现代文献的主要阅读对象则是广大民众；三是研究范围不同，传统文献局限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而现代的政治学工具性文献则不限于某个国家，而是放眼整个世界。毫无疑问，对于现实的政治进步和政治教育来说，现代的政治学工具性文献更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为了填补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的不足，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早在2017年就决定开展“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编撰工作，这一研究工程得到了北京大学的全力支持，被列入“双一流”专项资助

计划。“政治通鉴”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不是编撰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工具书，甚至也不是编纂政治学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研究工程，本项研究将努力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有哪些；第二，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其中哪些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第三，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第四，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转化；第五，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来人类的理想政治应当是什么。

显而易见，这样一项大型基础研究工程，仅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决定依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动员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按照我们的设想，最终成果将是多卷本的《政治通鉴》，既包括政治学经典文献，又包括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并且充分体现中国政治学者的独立观点。该项研究不仅将总结和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一般规律，也将分析和探讨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普遍规律。此外，“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实施过程，也将是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过程，是“政治通鉴学派”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通鉴》，就是“政治通鉴”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每一卷《政治通鉴》均包括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五）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五个部分其实也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五个子课题，其中“政治经典文献选编与研究”由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负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负责，“重要政治人物研究”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负责，“主要政治理论研究”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杨雪冬研究员负责，“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由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负责。

我们计划陆续编撰出版的《政治通鉴》既不同于《资治通鉴》等传统政治文献，它不是简单的政治实录，其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更不是为君王提供统治的镜鉴；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它收录的重点是政

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政治通鉴”研究和《政治通鉴》撰写过程中，我们努力要求作者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将叙述和分析相结合，每个部分都将包括经典文献和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以及作者的主观分析和评论。第二，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对所论及的政治制度、人物、事件，不仅要作纵向的历史分析，还要作横向的比较研究。第三，将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政治通鉴》的内容既包括整理和汇编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学经典文献和政治思潮，同时也包括各国政治学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成果。

“政治通鉴”研究与《政治通鉴》撰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通力协作与支持。最终成果的陆续出版，首先要归功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坚定支持。北京大学当初决定建立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新实体机构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包括编撰出版《政治通鉴》。没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实体机构的支撑，“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编撰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要感谢全体作者的贡献。《政治通鉴》的作者，不只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更多的是中心之外的相关领域专家。由于《政治通鉴》选录的条目大都是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通常都会有专门的研究者及其代表性成果。当编委会邀请这些专家学者为《政治通鉴》贡献其最新成果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最后要特别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为了保证《政治通鉴》的顺利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还延请了当年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资深编辑参与审稿。由于需要致谢的人数众多，恕我在这里不一一列出名单，哪怕是贡献重大的领导和学者。

按照“政治通鉴”的研究与《政治通鉴》的编撰计划，我们在多卷本的《政治通鉴》全部出齐后，还将按照五个主题的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分门别类再出一个版本。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特别欢迎各位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我们及时修订和完善各个条目的内容。

专家评论

《政治通鉴》为中国政治学树立了一根支柱

李景鹏

北京大学教授

首先祝贺可平主编的大作出版，这是中国政治学者为政治学大厦的建设树立起的一根支柱，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它将会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设虽然已经经历了120年，但是这中间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影响了政治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我个人就常常痛感对政治学的知识一知半解，对政治学的理解半生不熟。《政治通鉴》的出版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学习和钻研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学者的成长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和知识的营养。

这套文献通过政治学名著、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制度五个部分创造了政治通鉴编写的新体例，使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象、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西方与东方等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出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

多卷本《政治通鉴》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集中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地努力才能实现。其间可能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干扰和困难，祝愿我们的团队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和困难，实现我们的最后目标。我等待着10年以后研读《政治通鉴》的全集。

我已经退休20年了，在这期间，学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第二代学者已经功成名就，第三代学者正在成为学院的主力，他们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学风正派、硕果累累，预示着学院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

政治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也仍然如此。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排除各种干扰，运用我们的研究成果造福我们的国家，造

福我们的人民。

《政治通鉴》提供的是现代政治学的 知识镜鉴和研究指南

邓小南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首先祝贺《政治通鉴》第一卷的出版，这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政治学者集体性的探索，也标志着新型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10多天前第一次听说这个书名，当时我就想，多卷本的书名一定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拿到书以前，我首先想到的是名称上只一字之差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当年尽管是皇帝赐名的，但是这种“资治”的意识，却是产生于中国士人强烈的现实关怀之中的。正像俞可平教授说的，讲政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但在传统中国有政治权力、政治活动、政治派系，却没有政治学。

拿到这部《政治通鉴》以后，一翻开，就明白它和《资治通鉴》大不相同，它不是面向当政者的进谏，而是学术精髓的体现。捧到手里，感到这本书厚重讲究，著述者有资深的教授，也有学界的新锐，同行同道，是一支富有活力的学术队伍。翻阅以后，看到内容和体例，觉得很有感触。政治学名著、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制度五个主题，以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通盘的设计，以中外古今的相通、论题关怀的相通，为实质性的学术理解和当今的政治选择提供理据与借鉴，托举起“通鉴”这样的核心关怀。政治通鉴的英文标题，以另种方式点明了书的主旨和意图。在我作为一个外行的理解当中，*Critical Dictionary of Politics*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解释性的词典，而是用精选关键词目的方式对这一领域里的重要理论、经典文献、研究者和前沿问题进行讨论和辨析性的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通鉴》提供的是现代政治学通贯性的知识镜鉴和研究指南，是兼具基础性和前沿性的工具文

献。书中的选题很多和历史相关，其中有史事的回顾，也有政治学的思考，而且还有一些精心撰写的研究述评。

近些年经常看到“历史政治学”这样的提法，把政治学与历史学联系在一起，加深了其纵深感和实践导向，同时也是学科交汇的产物。从根本上说，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反思，不仅追寻历史的经验，也反思历史的教训，思考中离不开社会科学理论的导引。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严重的前车覆辙，可能纠偏于一时，却并未能积淀为全民族的深刻镜鉴，这正是因为缺乏集体性、学理性的深入讨论与严肃反思。

在今天的世界上，疫情、科技、教育、文化几乎方方面面都贴上了政治的标签，但真正能够遵循理性原则，观察政治体制与政治行为，辨析思考、理性处置者却并不多见。与此相对，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粗陋浅薄、无视理据则比比皆是。就学界而言，如何把握深层问题，回归理性，是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考虑到这种情势，编纂《政治通鉴》的深意或许正在这文本背后：它关心人类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关心政治学的本源问题，关心政治学研究的根本路径，也关心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政治通鉴》是北大政治学的重要生长点，这不仅是一套多卷本的文献，更是一个重要的传布平台和培育基地。祝愿政治学人的理念扎根结果，圆满成功。

《政治通鉴》突破了“以史为鉴”的传统视界

杨河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收到俞可平教授主编的《政治通鉴》第一卷以后，我认真通读了一遍，感受很深。

第一，《政治通鉴》继承了中国文化“以史为鉴”的好传统，力求在中国重政治历史考证的基础上，另辟出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当代政治学考证的一种学术的新天地。就此而言，《政治通鉴》的编辑和出

版，有助于填补中国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不足的缺陷。

第二，《政治通鉴》又突破了“以史为鉴”的中国眼界，以更广阔的世界视域来透视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现象中的政治发展规律，进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政治规律。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就此而言，《政治通鉴》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第三，《政治通鉴》还拓展了对政治学的认识，《政治通鉴》强调有优良的政治制度才有优良的治理，并且力求阐述政治学研究对于确立人类基本政治价值，探索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确立政治评价标准，推动人类政治进步等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政治通鉴》的编辑出版，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在《总序》中，俞可平教授提出，要依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动员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多卷本的《政治通鉴》。我想，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和期待，十年磨一剑，这一工程一定会有丰硕的成果。

政治既需要理性，也需要智慧

李强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

《政治通鉴》的问世是政治学界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我们都知道，政治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讲过，在所有的科学中，政治学是最权威的一门科学。因为正是政治学规定了其他科学的目标及应用范围。譬如，要不要用基因技术改变人的基因，一个国家可不可以发展核武器，这些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在政治清明、秩序井然的社会，人们并非每日每时都会感觉到政治学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政治问题往往会被归结为单纯的管理问题，包

括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管理技术等问题。例如，西方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主流政治哲学集中关注的分配问题，实质上不是政治哲学，而是管理哲学。我国最近几十年来在政治学复兴的过程中，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方面的学问成为显学，遮盖了政治学的光芒，其理论预设就是政治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只要在既定的政治原则下研究高效的管理即可。

但是，当社会遇到重大危机或重大不确定性时，政治问题就会变得尖锐，政治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什么是政治？如果我们借用著名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话来说，政治的核心是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会存在诸多矛盾甚至冲突，有经济利益的、宗教的、伦理的，甚至美学的。当某种冲突变得十分尖锐，从而导致朋友与敌人的区分时，政治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似乎是管理的问题也变成政治问题。

今天的国际与国内局势都使得政治的地位急剧上升。在国际上，整个世界处于非常不确定的状态。“冷战”结束后，人们所期望的世界和平并未出现，相反，世界日益走向一种无序状态。伴随着技术革命、全球化，以及现代国家体制在诸多地区的衰落，认同政治日益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导因素。基于种族、民族、宗教认同基础上的政治冲突不仅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激化，而且也成为许多国家内部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少数精英受益，而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就业和收入则受到严重冲击。反全球化、反移民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政策愈来愈对那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人群具有吸引力，以认同政治为基础的右翼民粹主义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的复兴也构成最近几十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考虑到整个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一趋势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困难以及西方国家的不公平对待，激发了民族主义的崛起，俄罗斯历史上的帝国理念又在“新欧亚主义”的口号下复兴，在欧亚核心地带重新构建“帝国体制”成为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神往的目标。这些情况表明，我们正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世界局势。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正在经受巨大挑战，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格局也开始松动。

当然，还必须提到，最近一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贸易摩擦的加剧、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蔓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冷淡，中美两个大国面临长期冲突的危险。与中美冲突相联系，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周边一些国家可能出现的关系冷淡甚至恶化的情况，都会使我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更为复杂和严峻。

在严峻的国际局势面前，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诸多需要探索的问题。我国制定了实现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是致力于实现两个重要转型，其一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其二是从苏联模式向新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甚至政治模式的转型。中国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财富的迅速积累又极大提升了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理性地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汲取人类文明中有益的成果，构建能够保障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仍然是需要不断努力的目标。在探索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注意到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国内政治的挑战，注意到全球范围内认同政治的蔓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包括全球性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的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政治学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政治学需要以创新精神探索理论、研究现实、汲取历史智慧、关注人类经验，提升政治学整体的学术水平，为我国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的现代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学担负着向社会大众和领导干部传播政治学知识的任务。柏拉图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政治的最高美德是审慎。审慎地处理政治意味着面对政治问题要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激情。对政治问题，不仅学术界要理性思考，而且社会大众和各级领导也要理性思考。政治的魔鬼是激情，激情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非理性政治的基础。政治问题的处理需要理性、需要智慧。而政治学的知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政治，处理理性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这套《政治通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套书的设计理念非常好。它涉及政治学的方方面面，涵盖古今中外政治理论、制度、人物、事件中的重大问题。我相信，按照这个思路一卷一卷出版下去，便会形成政

治学的皇皇巨著。它不仅会为政治学界的教学与研究提供十分宝贵的参考文献，而且也会为社会大众理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供权威且简明的读本。

《政治通鉴》开创了一个“通鉴学派”

张小劲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首先要向可平教授以及各位编者表示祝贺，祝贺《政治通鉴》第一卷的出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第一步，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也许是因为年岁渐长，今天的场合令人感慨，使人能够回想起许多的历史片断。第一个片断是40多年前政治学科步履艰难的复建，在座的李景鹏老师是那一代师长的代表，在座的各位则是后来的受益者。第二个片断则是30多年前，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波引进翻译外国学术辞书的浪潮，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参与过，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牛津法律大词典》以及《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等等；这一系列的翻译建构了一座桥梁，跨越了中外学界学术上的差距和相互隔绝的历史格局。从历史片断联想到今天，可以看到《政治通鉴》显然是一个新的开端。在这里，我愿意讨论《政治通鉴》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刚才有几位学者提到，《政治通鉴》开创了一个“通鉴学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广义的政治学派，强调的是人文、理性、科学的精神，凝聚了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体现了中国政治学者作为一个群体的学术努力和学术发现，更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现实焦虑和终极关怀。就内容而言，《政治通鉴》无疑渗透了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尽管这些经验和教训有时候在行文中并不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但是很显然，从选目的偏好到写作的内容仍凸显了中国的整体场景和中国的政治需求，也是对当下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代中政治挑战的思考。整个框架包含了中国政治智慧、中国政治经验的内容，因此，《政治通鉴》也是中国学者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一种对话。

第二个特点，也是刚才有学者提到的，《政治通鉴》不是词条式而是专题论文式的，这种编排和写作方式更合乎政治学学术知识的体系化。词条的编选和写作往往过于零散，其功能在于遇到困惑不解的时候进行查阅而不是学习，而《政治通鉴》的特点是以学科体系展开并且可以便利读者进行学习，尤其是随着篇幅的推进，其体系性还会进一步显现。从第一卷的文章和编辑来看，《政治通鉴》既是学科化的，同时又突破了学科边界；既是稳定的体系，又是最新动态的。无论是指导者的组织还是后来的写作者，都应当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努力，以完美实现已经确立的写作意图。

第三个特点，《政治通鉴》不是一部简单的出版物，而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一个思想对话的论坛，更是一个学者合作的场所。当然，未来我们更期待《通鉴》的编写能够像几位学者提到的那样，在疫情过去以后，我们更多地以面对面的方式对某些论题展开专题学术研讨，那样就更有意义了。在这里，我也应该代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对《政治通鉴》的事业表示支持和合作的态度，也利用这个场合做一个说明，作为《通鉴》编者之一的杨雪冬教授刚刚完成正式调入清华的手续，在这个意义上讲，清华政治学系对《政治通鉴》的支持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表态性的。

最后，感谢《政治通鉴》把我们这样一些学者聚集在这样一个场合，使得我能够回想起这些历史片断，也能够跟大家分享其间的一些想法。总而言之，祝愿《政治通鉴》的事业越来越好。

《政治通鉴》不仅是一项编撰工程， 而且是一项研究工程

周光辉

吉林大学教授、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多卷本的《政治通鉴》拟呈现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就，使后人可以跨

越时空与政治学经典、政治文明传统进行对话。像这种费时、费力的庞大的基础研究系统工程，只有北大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来组织完成。我相信《政治通鉴》的推出对于政治学科的建设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第一，谈谈我对《政治通鉴》的初步理解。

对此我概括为三个一：一个主题，一条主线，一个世界。一个主题：《政治通鉴》核心主题是呈现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就；一条主线：《政治通鉴》将政治置于历史的演变中呈现古今之变；一个世界：《政治通鉴》将中国置于世界中并在放眼世界的视野下呈现中国学人的家国情怀。

《政治通鉴》的最大特点，不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简单整理和汇编，而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深入研究，是要通过深入研究揭示人类政治文明成就背后的内在规律，系统简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所蕴含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不仅是一种编撰工程，而是一项重大的研究工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撰写《政治通鉴》的现实意义，从解释学的角度讲，是对人类传统政治文明的经典文本和类文本进行当代阐释。只有通过当代的重新阐释，蕴含在古典文明中的价值和意义才能被当代人所理解、所接受，成为一种公共性解释，从而赋予了古典文明以生命力，一切历史才可能转变成当代史。

第二，谈谈我对《政治通鉴》的期待。

除了对即将陆续推出的其他卷《政治通鉴》抱有期待外，我个人的一点期待是，作为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可否增加关于政治学方法的内容。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制约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能力提升的最大短板是研究方法的不足，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是政治学发展的方向。

《政治通鉴》是政治学的基础工程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政治通鉴》的发布在当下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谈点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中国：一个是历史的中国，一个是世界的中国。

中国首先是历史的中国，也可以说是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国家。我经常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不仅仅意味着过去，而且是对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连接。这与中国文明进程有关系。黑格尔比较世界文明后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本来，在黑格尔看来，印度的古文明也保存下来了，但印度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国家。“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印度人没有纪事的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事实的历史。”与印度不同，“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这种历史感使中国人将自己与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就必须穿透历史。这在于中国是在一个空间地域上通过王朝更迭形成的多次性帝国。后人总是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史记》《资治通鉴》便是标识。不读懂《史记》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中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缺乏政治学。这是因为，在近代之前中国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文明国家，自我发展，只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反思，因为反思需要参照。到近代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仅仅依靠历史中国的学识经验已经远远不够了。历史的中国是形成的，是一种自然的演进，内生型的演化；而世界的中国是建成的。建成和形

成是不同的。建成的是人为建构的，人有价值、有目的，需要知识和理论，这样就需要政治学。中国有政治但是没有政治学，历史的中国主要是要通过叙事对事实进行描述和认识，对政治有很深的见解，但是没有通过学科概念和知识体系把它理论化，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政治学”。所以，中国的政治历史漫长，政治学却非常短暂，需要从基础工程着手。

《政治通鉴》是政治学的基础性工程，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通”，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第二个是“精”，在政治学体系中选择有影响力的论著和专题；第三个是“深”，它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研究性的挖掘，是学术性的表达。这为《政治通鉴》产生广泛的影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处于打基础阶段，需要两个“吃透”。一是吃透理论，特别是经典理论；二是吃透实际，把握和跟踪政治现象。中国政治学从建立以来，始终是追随式研究，一方面追随西方理论，另一方面追随政策变化，没有能静下心来进行钻研性研究，这样就使我们在学术上没有足够的底气。政治学必须要研究政治规律，政治规律是对长时段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的提炼，所以我们还得追踪政治现象的变化。《政治通鉴》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

《政治通鉴》是一个大的工程。我提点自己的看法。

一是要考虑工程定位，是记录还是研究？如果是记录，国外有年鉴学派，我们这个通鉴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

二是面对专家还是面对普通人群，还是面对现在的干部，要定位清楚。

三是学派，现在提出“通鉴学派”，是好事。一个学科的成熟，重要标识便是学派的形成。学派表示学术的自主性和原创性。追随式研究是永远不可能有学派的。但作为学派，有一些基本要求，要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是别人不做的，或者是做不好、做不了的，这才是我们学派应有的地位。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明晰和长期努力的。

《政治通鉴》的编撰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陈国权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政治通鉴》的出版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意义非常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一大批大工程建设项目，像高速公路、高铁、大桥、机场，不少工程堪称世界奇迹。但是，我们在理论建设上远远没有取得与工程建设相媲美的成就，造成了物质建设与思想发展不相称的失衡现象。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在俞可平教授的领导下，扛起发展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旗帜，打造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宏大工程，为时代贡献理论智慧与精神价值。北京大学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北京大学政治学科是一流的学科，理应引导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政治通鉴》编写这项宏大工程一定会很好地起到这一重要的引领作用。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还存在类似于改革开放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低、小、散”现象，现在我们需要集成研究议题、集聚研究队伍，完成理论建设的宏大工作，《政治通鉴》编写与研究正是这样一项宏大的理论工程。

《政治通鉴》包括政治学名著、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制度五个部分，这是非常好的框架，希望编者在这个框架下重视地方政治的视野，加强对地方政治事件、地方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特大型国家，一个省的治理规模往往比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治理规模都要大。中国很多政治实践、政治思想是从地方开始的。中国的地方政治思想、地方政治事件、地方政治人物会成为国家性的事件、思想和人物。希望《政治通鉴》重视对地方政治的研究。

《政治通鉴》既有知识价值， 也有认知价值和实践价值

肖滨

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这本书出版得正当其时，因为全球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中国更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一本大型的政治工具书，《政治通鉴》主要有三大价值：一是知识价值，提供政治学的基础知识。不仅广大的学生，甚至普通民众都特别需要补政治学基础知识这门课。二是认知价值，提高政治理性水平。面对内政与外交的紧密互动和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理性的政治分析、冷静的政治判断，需要清醒的政治理性。三是实践价值，提升政治文明的品质。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得到知识和价值的引导。我提一点小建议，有些栏目的编排还可以考虑得更仔细一些，或者说要有明确的挑选原则。比如，政治事件部分把“秦始皇统一中国”和“17世纪英国革命”并列，政治人物部分把“隋文帝”和“华盛顿”对举，就显得有点突兀，读者可能不太明白编者为什么要这样选编，而且也会让阅读的跳跃性太大。

《政治通鉴》的特点是古今中外相结合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

刚才大家都讲了中国的政治学可以说还处在一个早期的发展阶段，我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但是我也能够感觉到：实际上干部也罢，或者是一般的学人也罢，除了专业研究政治学的人和稍微专业一点的人之外，对政治学的知

识、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规则还处在相对无知的阶段，这无论对学术的进步还是对中国政治的发展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

关于《政治通鉴》的定位，我感觉它应该比一般的通俗读物要高，但是比专业的研究还稍微浅一点，对于政治学的初学者，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往前走的基础。在国外的图书馆可以看到，对每个学科相关的基础知识还是有大量的准备性的文献资料，可以让研究者能够很容易地在稍微集中的时间内系统掌握这个学科的基本面貌。我们中国诸如此类的文献还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政治通鉴》的出版能够在这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对于中国政治学知识深入地普及，对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大家刚才提到了《通鉴》跟法国的大百科全书的比较。我以为，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百科全书派的研究有的是很精深的研究，比如说卢梭最重要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就是给百科全书写得条目。我希望我们的《政治通鉴》条目的写作也能与此类似，不仅仅要起到普及知识的作用，在知识的创造方面也能起到引领的作用。百科全书派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充分体现了人文、理性、科学的精神，这三种精神对现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依然适用。政治学研究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不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我们的政治要以人为本，科学理性，而不能仅从愿望出发，也不能仅从单纯的政治目的出发。希望《政治通鉴》能够体现跟百科全书派一样的追求。

《政治通鉴》的特点是把古今中外结合在一起了。实际上，现在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机。中国方面，虽然说我们现在强调自信，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之处。希望通过《政治通鉴》的编纂，能够为解决中国或者西方国家的问题提供我们自己的贡献，或者是提供我们自己的答案。也就是说，希望《政治通鉴》的编纂能够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推动力。不知道第一卷中包含的这几个条目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经过学术研讨？我们以后如果为一些重要的条目组织一些学术研讨会，可能对于进一步提升这些条目的质量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提几点建议。我看了一下第一卷里面的内容，大家的写作风格不太一样。建议以后的条目当中增加两方面：一是相关条目的学术史。第一卷里面

的条目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增加学术史的内容，对于阅读《政治通鉴》的人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二是增加学科前沿的内容，有的条目里面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内容，有的条目这方面少一些，如果能够注意一下就更好了。三是现在这几个条目体例上有一些差别，如果能够统一的话就更好看一点。

最后希望《政治通鉴》越做越好，不管是 10 卷还是 20 卷，希望一直把它编纂下去。